

李元貞《女性詩學》——台灣現代女詩人集體研究（1951–2000）

◎ 林怡翠

李元貞的《女性詩學》雖然以相對於傳統男性文學批評的在野位置出發，卻無意自甘於「外一章」的角色。

多數的文學論述，以男性創作者及其主導的運動為視角的中心，而這一套文學史的分期卻無法容納女性的發展，這當然與文學機制、主流評論、話語生產等的父權結盟有關。當我們習慣於「正統」陽具語言體系的使用，以及它所衍生而成的道德、權力、文化，甚至是審美的符碼，我們也自然而然地吸收了它所「製造」的整個知識真理，正如我們原先所接受的現代詩學及其種種聲明。

《女性詩學》的書寫毋寧是「政治」的，李元貞一方面揭露女詩人在詩壇的邊緣地位，一方面質疑父權真理的合法性。因此，在〈台灣現代女詩人的詩壇顯影〉中，詳細列舉了女詩人在詩壇中出現和受矚目的過程，其中有趣的現象是，女詩人除了在男性主持的詩刊、詩社和詩選中現身，自印詩集卻佔了很大的比例，而後經由媒體或男詩人的推薦而得以成名，說明了女詩人在詩壇及市場上不能自主的情況。同時也彰顯了男詩人及批評家如何以簡化的性別語言來面對女詩人的作品，使女詩人的價值被限制在偉大的母親、等待愛情等範圍內，「女詩人」一旦成為標

籤，真正的女性經驗和集體身分認同即沉默消音。

然而，《女性詩學》並不只是消極的批判，更要透過言說和研究確立女性主體的中心性。這是一次由抵抗到中央的政治運動，將女詩人的寫作放至文學論述的主要章節中，作為對附屬於男性歷史之下的抗衡。

正如李元貞所說：「在討論女詩人作品裡的性別面向時，必然觸及女作家作品與社會及文化的交互關係，同時勾勒出女作家寫作（製作）的女性主義的開放性策略。」從對傳統的性別語彙和其社會文化層面影響的價值複製，到主體的騷動，以及女性主義的反男性中心，女性詩人的寫作始終和社會的動態息息相關，而不能孤立視之。

《女性詩學》的研究對象雖是女性詩人的作品，表面上發聲的是文本，實際上卻是整個關於性別的知識體系。其中針對台灣現代女詩人在國家論述、情欲想像、敘事方式、社會正義、語言實踐等問題上的著墨，可以說是在深入女詩人的社會參與，和理所當然的相關性。女詩人並不是如男性批評家所想的，或長期在父權壓抑下那樣的靜止，而是以她們女性的位置和視野，介入社會、政治和環境的關懷，這就是「女性」的書寫和中心，不是男性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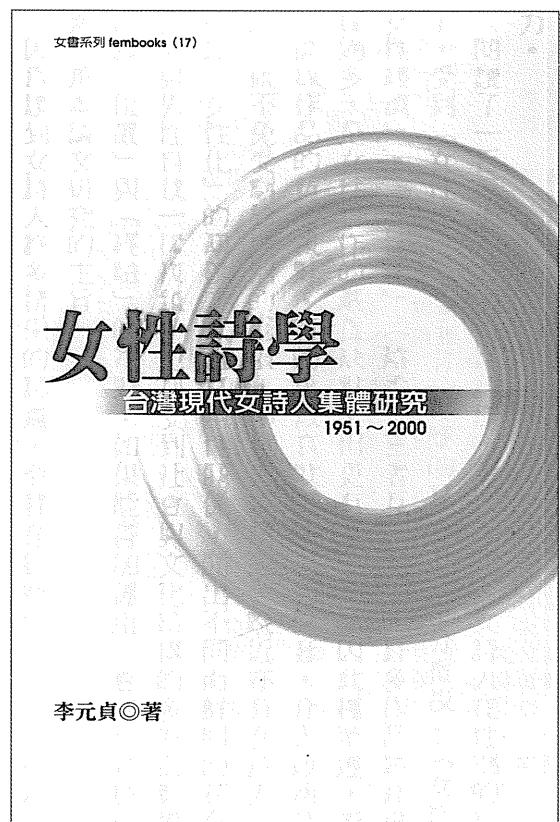
角的相反面，而是完整的她自己和主體，和歷史交談。

因此，《女性詩學》不能被單純地看待為一部以女詩人和她們的作品為討論對象的批評作品，目的也不只是女人要建立自己的一套詩學系統，而是認清和扭轉台灣現代詩文學觀察、發言權的階段性開端，是性別權力世界的敲門磚。

然而，李元貞也清楚的知道，台灣現代女詩人的作品以其集體面目來看，的確有缺憾之處，主要是這些女性身分的主體認同顯得過分的統一，也就是女詩人的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特性形成女性問題中的另一種霸權，而種族、階級、性別取向等差異因此消失。就另一方面來說，這仍舊和女性詩人文壇、社會地位的取得，不得不與男性社會有某程度的掛勾相關連，《女性詩學》對此雖無明確的討論，但是卻成為提醒，提醒台灣女性進行權力的全面解構，避免「女性主體」流於一種過於方便和簡單的工具，而忽視其複雜的政治性。

《女性詩學》可以說是對固有詩學傳統一次全面的反思，也為女性主義詩作開放性的未來奠立新頁。《女性詩學》雖是以女詩人及其作品為對象的書寫，而少與男性詩作和其美學進行對談交錯，而我們也相信這樣的發言位置，終有一天會以包

容而多元的姿態，帶出一份完整的批評視界。



女性詩學／女書文化／2000.11